

# 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与明朝改革的轨迹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自永乐以来, 明朝最显著的政治变化莫过于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这一剧变所引发的政治变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其以清除强迫世宗改换父母的杨廷和集团为主线, 以主张以法和以情议礼的张璁等人的崛起为显著标志, 在确保武宗皇权向世宗全部转移的路径中清除了旧势力, 刷新了政治, 增添了活力, 其影响延续至万历前期。“张居正改革”其实就是顾命之臣张居正对嘉靖革新全力效法的政治实践, 或者说是嘉靖革新的余波。与杨廷和一样, 张居正并未解决好穆宗皇权向神宗全部转移的难题, 使嘉靖革新淹没在对张居正的全面清算浪潮之中, 而新的变革活动又难以形成, 明朝便在失控中走向衰亡。

**[关键词]** 明世宗; 大礼仪; 杨廷和; 张璁; 张居正; 政局剧变; 改革轨迹

**[中图分类号]** K 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2)06-0119-11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2.06.011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 其内部的革新主要有两次, 皆与政局的剧变有关。一次是明成祖朱棣对明太祖朱元璋创制的革新与完善, 并与其创建的制度成为明代的“二祖”之制, 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第二次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兴废举坠与革故鼎新, 对永乐以降的弊政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清理, 一直持续到万历前期。这一阶段协助皇帝革新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张璁和张居正。二人的谥号皆为“文忠”, 其中张璁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八册中, 业师蔡美彪先生等人摈弃了传统的偏见, 高度肯定了张璁的革新行为,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明代先后两张文忠, 均以兴革为己任”<sup>①</sup>的全新见解。笔者在此基础上, 先提出了“嘉靖革新”, 后又提出了“嘉隆万改革”。从张璁到张居正, 反映着永乐以后明代改革的独特模式和发展轨迹。在明代, 只有君臣合作, 才能有所作为。在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中, 张璁等新兴势力借助“大礼仪”与世宗相知相识, 迅速崛起, 取代了执意与世宗对抗的杨廷和集团, 其与世宗开创的嘉靖革新持续到万历前期

张居正去世之时, 反映着自永乐以后明朝改革的显著特征与清晰轨迹。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探究, 有助于认清明朝改革的特点和政局演变的走向。

## 一、武宗暴亡与政局的剧变

明代共有16位皇帝, 除朱元璋外, 按照父子继原则即位的有10位, 异常继位的有5位。在这5位之中, 建文帝以嫡孙继位, 明成祖通过武力夺得皇位, 景泰帝因其长兄英宗被俘而称帝, 明世宗因其堂兄武宗暴亡绝嗣而按照“伦序”继位, 崇祯帝因其长兄熹宗无子而以遗诏继位。其中, 明成祖是惟一用武力方式获得皇位的, 其他4位皆以“伦序”原则而顺利继位。除世宗外, 建文帝、景泰帝、崇祯帝皆死于非命。而在明成祖以后的3位异常继位的皇帝中, 景泰帝临危受命, 代理国政。称帝后, 一意孤行, 废黜了被立为皇太子的英宗之子, 立己子为太子。后来英宗被放回, 景泰帝将其禁闭。不难看出, 景泰帝私欲膨胀, 难以妥善处理各种复杂关系, 最后在“夺门之变”中失去皇位。

**[收稿日期]** 2022-08-09

**[基金项目]**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2018年资助项目“从张璁到张居正——明代改革的演变轨迹与经验教训”;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边疆治理视野下的明代绿洲丝绸之路研究”(18AZS022)

**[作者简介]** 田澍(1964—), 男, 甘肃通渭人,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 主要从事明清史、西北边疆史研究

在景泰帝之后，世宗的继位是一个全新的个案，无先例可循。世宗既不是武宗临终前选定的继承人，又不是武宗的同父兄弟，而是在武宗暴亡后由各种势力根据祖训中的“伦序”原则予以确立的。面对自己称帝的特殊性和“不讲人情的专断逻辑也并不比宋代逊色”<sup>②</sup>的杨廷和集团，世宗重视人伦，强调差异，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削足适履。针对杨廷和等人所设置的障碍和一再的刁难，世宗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因为意外获得皇位而随便更换父母，甚至提出了退位的想法，以示自己不会迷恋皇位。这是中国古代非常罕见的现象，足见世宗面临的阻力之大，也足以说明世宗为了捍卫与父母的固有关系而不会放弃自己做人的基本尊严。

在世宗看来，“做人”与“做君”是统一的，或者说，基于常理和自我内心感受，“做人”才是“做君”的前提。首辅杨一清认为：世宗“遵高皇之大法，图治务正夫纲常；率猷考之嘉猷，立爱必先于孝弟”<sup>③</sup>。游走于议礼双方的阁臣费宏也不得不说：“伏以圣人抚运，九畴式叙夫彝伦；至孝因心，四海仪刑于德教。礼惟从厚，文必称情。盖事冠于古今，宜欢腾于中外。恭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文武圣神。一德昭升，应五百年之历数；群心推戴，为亿万世之君师。秉离照以继明，奋乾刚而独断。惟皇作极，敛五福而赐厥庶民；率下以仁，由一家而推之万国。大义特隆于正统，至情兼尽于本生。”<sup>④</sup>加拿大学者卜正民论道：“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王阳明避免直接表态，但他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未尝不怀有几分同情，故视之为纯孝至情的流露，而在他看来，孝是道德行为的真正基础”，其“关于良知为心之本体的哲学不再是袖手旁观，而获得了政治立足点”<sup>⑤</sup>。正是基于对孝情成功的维护，世宗才能理直气壮地宣告：“朕以冲昧之资，上荷天命及祖宗、皇考、圣母余庆，延及朕躬，以藩服入继祖宗大统，位之诸王臣民之上。”<sup>⑥</sup>

在明朝5位异常即位的皇帝之中，最特殊的莫过于成祖与世宗两位君主。朱棣之所以起兵夺权，就在于建文帝无视所处的政治环境而盲目削藩。由于建文帝智术浅短、能力不足，加之操之过急、应对不力，导致全盘皆输。朱棣继位之后，其政治能力远超建文帝，是明朝乃至中国古代难得的有为之君。而景泰帝要应对“土木之变”所带来的不明政情和帝位不稳的巨大风险，政治空间有限，难有大的作为。崇祯帝尽管铲除了阉党，但面对神宗以来

病入膏肓的明王朝，无力革新自救，难以力挽狂澜，只能做一个被人惋惜的亡国之君。在明成祖之后，唯有世宗的继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所谓自洪武、永乐之后明朝“天子们往往是宫廷里长大的，常常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仅限于紫禁城内”<sup>⑦</sup>之类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就明朝历史而言，政治剧变的显著标志就是皇位的异常更迭和由此引发的人事更替。研究明朝的改革历史，首先要关注朱棣和朱厚熜两次皇位异常更迭的政治意义和巨大的政治效应。与朱棣用武力夺取皇位不同，朱厚熜是被太后、阁臣、宦官等势力根据祖训联合推举的，故在短时期内难以清除前朝旧势力，也难以从他们手中获得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

尽管相当一部分人对明世宗冷嘲热讽，但必须正视世宗以特殊身份即位而带来的新气象，即“更化之朝”或“嘉靖中兴”。正如杨一清在嘉靖四年（1525）所言：“仰惟皇上以上圣之资，光临大宝，万方仰德，四夷向风，天下臣民凡抱一长、挟一艺者，皆思自效”<sup>⑧</sup>，出现了“道路欢传，缙绅交庆，咸谓百年旷典，今始见之”<sup>⑨</sup>的景象。明人沈德符亦言：“世宗入绍，时局一新矣。”<sup>⑩</sup>

如果说朱棣在朱元璋之后构建了“新明朝”的话<sup>⑪</sup>，那么，在其之后，朱厚熜又第二次构建了“新明朝”。作为藩王出身的朱厚熜，登基后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难题就是如何与前朝旧臣相处。由于自己势单力薄，即位之初被前朝势力所控制就不可避免。但出于本能和在宫外所接受的特殊教育，机敏的世宗“不愿接受杨廷和提议的傀儡地位”<sup>⑫</sup>，拒绝成为杨廷和手中的玩物。所以，清除前朝旧势力，打破杨廷和集团的包围圈并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力，像朱棣那样自我控制朝政，便成为世宗首要的政治目标。但在即位之初，世宗无力向杨廷和集团挑战。一方面，世宗不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杨廷和集团；另一方面，世宗也不可能依靠内廷势力来铲除杨廷和集团。

在武宗暴亡之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君臣关系，杨廷和等人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一定要明白，武宗的暴亡并没有带来明朝体制的突变。如果他们头脑发热，把握不好分寸，就会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就世宗即位时的情形而言，“二祖”之制十分稳定，皇帝就是皇帝，阁臣就是阁臣，世宗的权威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阁部大臣只能是皇帝

领导下的朝臣，包括杨廷和在内的任何人绝不可能挟持皇帝。尽管明朝的皇位空缺一个多月，杨廷和暂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肯定，但这绝不意味着杨廷和的阁权因此而得到了强化。如果他利用所谓的拥立之功而居功自傲，专横跋扈，将自己凌驾于世宗之上，那将是最愚蠢的行为。

在世宗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够“意外”称帝，主要在于祖训的约束力。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不用感激任何人，也不会因此向任何人屈服，故能以独立的姿态君临天下。由于杨廷和等人在推举其称帝过程中遵循了祖训，没有节外生枝，故掌握着主动，最有可能与朝中无任何依靠势力的新帝合作共处，以辅佐其维持政权的平稳过渡并因此延长自己在新朝辅政的时间。这就要求杨廷和放下身段，首先要取得世宗的信任，设法将暂时的主动转化为与新君积极合作的政治资本。只有如此，杨廷和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才能洗刷自己在正德时期的失职。武宗的暴亡确实给杨廷和带来了展示自己才能的难得机遇，能否抓住这一机遇，是认识杨廷和是否具有政治才能的关键节点。

要取得世宗的信任，就要求杨廷和能从大局出发，设身处地地为从湖北前来即位的世宗考虑，充分理解其内心的基本诉求。杨廷和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暂时的主动并不等于绝对的优势，由于自己与世宗没有任何交往，相互陌生，对其性格了解不多，一旦自己狂妄自大，小觑世宗，误判形势，结党抗君，就会全盘皆输。

在正德、嘉靖之际政局的剧变中，杨廷和试图“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并不顾自己的身份，“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世宗“因杨的专横而苦恼，但他的手是被捆着的”<sup>⑧</sup>。杨廷和素来与平定朱宸濠叛乱的王守仁和支持王守仁平乱的兵部尚书王琼不和，在王守仁捉拿朱宸濠之后，“内阁大臣素恶晋溪，亦忌公。而公以提督军务，故得专制，召兵平贼，归功晋溪，内阁不悦，久之不论功”<sup>⑨</sup>。针对此事，首辅杨一清认为杨廷和利用世宗立足未稳之时“报复恩仇之事颇多”，

将王琼投入诏狱，治以死罪，“此则廷和报复之过也”<sup>⑩</sup>。

然而，不论杨廷和如何编织自己的权力网，都不可能真正强化自己的权力。由于世宗掌握着“大礼议”的主动权，杨廷和很快由主动变为被动，使自己变为新君所要竭力铲除的对象。正如《明史·王琼传》所言：“初，帝恶杨廷和，疑廷臣悉其党，故连用桂萼、方献夫为吏部。”<sup>⑪</sup>就王琼被迫害一事，世宗认为是杨廷和利用自己新到而不谙朝政所致，他对杨一清说道：“琼之罪恶，其在先朝，坐何律条，及朕即位，始治罪下狱。其时朕略于政事，本以味荒。”<sup>⑫</sup>杨廷和为所欲为、专权乱政的行为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成为制度。在该时期的皇位更迭中，无论杨廷和有何功劳，都无力与世宗对抗，其失败是必然的。

## 二、张璁的崛起与杨廷和的失势

纵观相关学术研究，一些学者既无法接受杨廷和失败的结果，又不愿探讨其失败的必然性，而是一味地挞伐世宗和张璁等人，把杨廷和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于世宗皇权的强大和张璁等人的“迎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世宗的继位是特殊的，但此时的政治依旧稳定，任何势力都无力乘机改变明朝的政治体制，也无力挑战世宗皇权。世宗即位之后，新君与老臣的矛盾再次上演，使嘉靖初年的政治又重演着新君驱逐旧臣的老套剧情。

就世宗而言，他无法像父死子继的君主那样利用东宫班底取代前朝老臣，客观上暂时还离不开杨廷和等旧臣。这一情形无疑增加了杨廷和的自信，再加上拥立之功，使其产生了幻觉，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sup>⑬</sup>。对世宗而言，只身入京，被前朝旧臣全面包围，动弹不得，自己要独立行使皇权是非常困难的。而要培养自己的亲信，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驱逐杨廷和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两相比较，世宗明显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但明朝政治又不可能让杨廷和把持朝政，胁迫皇帝。杨廷和的“大礼”主张被否决的过程，其实就是其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过程，也是张璁等新生力量崛起的过程。嘉靖五年（1526）世宗说道：“朕以冲人，纘承丕绪，自谅德寡，昧勉而行之。欲尽持敬之功，以驯致乎一德。其先务又在虚心寡欲，驱除邪逸，信任耆德，为之匡辅。”<sup>⑭</sup>张璁亦言：“不虞更诏三遍，卒劳聚讼五年。非圣明

作之君师，几国家乱其伦序。于是洗汉宋为后之习，率夏商及王之章。嗣不失亲，父父子子；统不失序，君君臣臣。”<sup>②</sup> 万历五年（1577）八月，张居正等人在《世宗肃皇帝宝训》与《世宗实录》的表文中认为，世宗对“仪礼制度，尤多考古宪经。统嗣正名，极严父尊亲之孝”<sup>③</sup>。世宗与张璁等人所议定的“大礼”无人能够推翻，并规定着明朝政治的基本方向。这是认识世宗继位之后明朝历史走向时必须尊重的一个基本史实。

毋庸置疑，世宗即位后如何行使皇权是当时的首要问题。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杨廷和等人身上，极力肯定杨廷和等人截留皇权的行为，把杨廷和与世宗不同的见解放大为“一场君权与阁权的斗争”<sup>④</sup>，并想当然地要让杨廷和来“限制”皇权，而把世宗打击杨廷和集团和收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视为皇权的强化。如言：“可悲的是，无论是大礼议一事中的嘉靖皇帝，还是杨廷和等朝臣，他们所争夺的恰好正是权力秩序中的制高点。世宗以藩王的身份入主大统，他要的是通过‘大礼议’重新树立皇权意志的权威；杨廷和从士权的角度去争，要的是通过占据道德权力的制高点进而限制世宗的意志和行为。无论争执的结果如何，世宗所争并非只是孝心那么简单，杨廷和所争也并非只是要约束皇权那么理想，二者争执的焦点皆落在看谁能够率先利用权力中的制高点而压制对方。”<sup>⑤</sup>以堂而皇之的限制世宗皇权来为杨廷和撑腰和辩解，实在是不得要领；将杨廷和视为与世宗对等的竞争者，则是对明朝政治的极大误解。而《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谓“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着专制皇权的复兴”<sup>⑥</sup>也不符合实际。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sup>⑦</sup>，在其顺利即位之后，杨廷和的任务便告结束。如何以世宗为核心恢复政治常态，便是正德、嘉靖之际首要的政治任务。这是明朝政治内在的根本要求，杨廷和没有任何理由要与世宗对抗，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世宗对抗，对该时期政治的过分解读和随意想象都是偏颇的。

在武宗暴亡之后，明朝政治处于无君状态，世宗顺利即位之后，标志着这一特殊局面的结束。但能否收回属于自己的全部皇权，是世宗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由于世宗自己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故一时难以离开杨廷和集团。这样，就必然产生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以世宗为核心构建嘉靖新秩序的必然要求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旧臣试图把持朝政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是认识正德、嘉靖

之际明朝政治演变的一个基本视角。在确保世宗顺利即位这一环节，杨廷和所做的一切是需要肯定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在世宗即位之后，杨廷和又走上了历史上权臣跋扈、挟持新君的老路，“大礼议”只能“激起皇帝对杨和他一伙人的怨恨”<sup>⑧</sup>，故不能把推行革故鼎新的任务寄托在杨廷和身上。

杨廷和拿牛头不对马嘴且本身就充满争议的汉宋旧例不可能解决世宗所面临的全新问题<sup>⑨</sup>，而面对张璁等人的正常批评，其试图用“道德”绑架张璁等人，把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支持世宗合法、合礼、合情的行为称之为“迎合”，将其塑造为毫无廉耻、谄媚皇帝的“小人”形象。一些研究者一方面抨击明朝高度强化的专制集权，另一方面又极力抬高利用专制权力和混乱局面打击异己的杨廷和集团，力图用杨廷和来压制世宗，对其截留皇权和打击异己大加赞赏，根本无视杨廷和集团迫害张璁等人的险恶之心，并用堂而皇之的传统“士道”来包装杨廷和，可谓选错了案例。

很显然，对杨廷和的美化和对张璁的丑化，根本不能解读正德、嘉靖之际政治变动的的基本走向。一些研究者从未认真思量，自己越丑化张璁的形象，越凸显张璁的“迎合”，越关注和放大杨廷和集团的可悲遭遇，恰恰说明杨廷和的无能以及于世宗关系的恶化！无视“大礼议”的是与非<sup>⑩</sup>，无视世宗面临的新问题，无视明朝的基本制度，鼓吹君臣矛盾与斗争，放大老臣对新君的欺凌，完全不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他们之所以无法理解和接受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悲惨下场，就在于没有客观地认识到当时明朝政治的高度稳定性。在实际的政治对抗中，老臣杨廷和根本不可能战胜年轻的新君，也不可能浑水摸鱼中改造明朝的政治体制。杨廷和只能是世宗领导下的一位普通的阁臣，根本不可能借助“大礼议”来强化所谓的“阁权”。他若自我膨胀，自不量力，以“拥立之功”或“捧日之功”自居，向在“大礼议”中掌握主动权的世宗挑战，并扩张自己的权力，只能是死路一条，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在清除杨廷和等旧臣之后，以世宗为主导的嘉靖政治秩序才得以确立。杨一清就此论道：“正德年间，视朝稀阔，大臣不复接见，以此威福之权下移近幸，纪纲法度几于荡然。天启圣皇，诞膺宝历，积年弊政，铲除无遗。废黜奸佞，登崇俊良，嘉靖之治，号为中兴。今天下之政务必由六部，拟议必由内阁。皇上总揽乾纲，万机独断，近臣不敢

干预，可谓千载一时矣。”<sup>②</sup>这是明朝政治运行的最佳状态，只有在清除杨廷和之后才能实现。在世宗即位前后，杨廷和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了武宗死后清除旧臣的政治要求，首先将所谓武宗时期的“奸臣”钱宁、江彬等人绳之以法。但杨廷和等人应该清楚，自己在武宗时期也不干净，当钱宁、江彬等“显恶”之人被清理之后，自身的问题也会被人揭发，自己也是被清除的对象，只是时间先后不同罢了。

要理性地把握正德、嘉靖之际政局的走向，就不能把“大礼议”看成单纯的礼仪之争，而要将其视为世宗恢复政治秩序所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客观上发挥着清除庞大的杨廷和集团的特殊功能。这是当时明朝政治的客观要求，杨廷和集团无力阻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武宗死后，要真正进行革新，就必须清除杨廷和集团。无视世宗的存在而以杨廷和为中心来认识世宗初政，是不可能认清该时期政治走向的。在“大礼议”中，杨廷和集团根本无法阻挡世宗的步步进逼，而张璁“能以辨博济其说”<sup>③</sup>，世宗借助“大礼议”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并很快将庞大的杨廷和集团彻底击碎，充分说明“大礼议”为恢复明朝政治秩序发挥了积极而特殊的作用。

世宗即位之后，正德、嘉靖之际人事更迭的显著标志就是张璁的崛起和杨廷和的失势。张璁的崛起绝不是其个人命运的简单改变，而是该时代政治剧变的集中反映。在“大礼议”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中，张璁“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引导方向的手”<sup>④</sup>，发挥着关键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仅仅拘泥于张璁个人命运的变化而一味地褒杨贬张，对世宗初政的看法含糊其辞，不知所云。尤其是站在杨廷和集团一边来讥讽张璁“迎合”世宗的做法，更不可能理性地看待该阶段政治发展的脉络。而讥讽张璁时丝毫不提杨廷和集团背着世宗对张璁等人的驱赶、围堵、侮辱和暗杀，则背离基本的事实。一些学者把杨廷和及其追随者打扮成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代表，而对张璁不计个人安危孤军奋战的行为缺乏基本的尊重，是明史研究中十分怪异的现象。如言：“张璁、桂萼辈借此迎合世宗意以希进”<sup>⑤</sup>，其“干进之心迹亦是极为明显的”<sup>⑥</sup>，而杨廷和之子杨慎“始终不屈服明世宗的淫威暴虐”<sup>⑦</sup>，其所表现出来的“刚强与执着无疑是为贯彻祖宗先例而奋不顾身地据理力争的忠臣典范”<sup>⑧</sup>。无视“大礼议”的是与非、

无视该时期政治实情而任情发挥的学风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张璁当时就说“独怜知己少，祇见直躬难”<sup>⑨</sup>，认为“讲礼由来谗口多，毁誉一朝原不顾”<sup>⑩</sup>，并直言“时举朝忌余，至有欲杀者”<sup>⑪</sup>。张璁蒙受了来自杨慎等“翰林院学者们之手的欺凌和屈辱。连翰林院最低级的成员也拒绝向他致意；对待他像对待一个无赖”<sup>⑫</sup>。杨一清对此提出了批评，说道：“皇上嗣极，首议尊崇之典，考经据礼，至再至三。既而采纳廷议，断自圣心，尊尊亲亲，亦既两尽，无复遗憾。夫何一时言礼之臣，不能推广圣上因心之孝，纷纭抵牾，力持初说，终乃率众伏阙，喧攘无忌，在礼法为不恭，在事体为不顺。”<sup>⑬</sup>王世贞在论及张璁声誉变化时认为：“公在公车最久，而其成进士仅六载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礼信之者，自明兴无两焉。凡所创革典制，虽上自信以天启，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对班班可据。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于议礼，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贵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称公是公非者半，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sup>⑭</sup>

杨廷和集团对张璁等人的丑化和侮辱集中反映着当时官场的僵化和无能，张璁“极言父子之伦不可夺，众不悦”<sup>⑮</sup>，并引发了广泛的恐惧，他们自以为是，根本无法理解并难以接受新进之人张璁的快速崛起，视其为洪水猛兽，与其势不两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张璁的脱颖而出代表着时代的剧变！张璁的崛起必然意味着杨廷和的失势，这个过程与“大礼议”相始终，集中反映着该时期政局变化的必然趋势。二人政治命运的不同走向绝不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反映着当时人事更迭变化的显著特点。故在认识二人政治命运变化时，首先要从杨廷和身上找原因。可以说，“新进书生”张璁的崛起是以杨廷和的决策失误为前提的，其以“朝中直气违权贵”<sup>⑯</sup>“自信是非千古定”<sup>⑰</sup>“是非祸福非所计”<sup>⑱</sup>的学术自信和历史担当向杨廷和的错误主张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引导着“大礼议”的走向，并将其逼向绝路。赵翼认为：“世宗之立，与汉哀、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续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sup>⑲</sup>如果杨廷和能从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出发，创造性地解决其面临的新的礼仪问题，张璁就无机可乘。张璁

就此论道：“皇上之人继大统也，以伦序也，遵祖训也。以为宜舍其父母而不尊崇者，廷议也。以为不宜舍其父母而尊崇者，臣孚敬议也。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者，皇上因心之孝也”，并明确认为“我皇帝所以为尧舜之主也，为人伦之至也”<sup>⑦</sup>。

可以说，是杨廷和向世宗引荐了张璁，并成就了张璁。换言之，是杨廷和为张璁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如果把握不好世宗、杨廷和与张璁三者的关系，就不可能理性认识正德、嘉靖之际的政治走向。世宗、张璁与杨廷和三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其中最初占据优势的是杨廷和。但好景不长，杨廷和的主动权很快消失，“大礼议”就是杨廷和逐渐丧失主动权的过程，即杨廷和集团失败的过程。杨廷和无法抓住历史提供的机会，再次证明其无力担当重任，用张璁等人的“迎合”为杨廷和遮羞之说可以休矣！

以正德、嘉靖之际愈演愈烈的哈密危机为例，就足以说明杨廷和集团的腐败与无能。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哈密危机的根源，故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之策，在胡乱折腾中导致哈密危机愈演愈烈，将战火直接引入嘉峪关内，“人民被其抢杀，室庐被其焚毁，产业被其荡析，河西生灵之厄亦已甚矣”<sup>⑧</sup>。为了党同伐异，杨廷和集团罗织罪名，吹毛求疵，肆意摧残像王琼之类的能臣，任由土鲁番“焚庐舍，剽人畜”<sup>⑨</sup>，随意侵犯肃州卫和甘州卫，让明廷颜面丢尽。张璁斥道：“王琼名若不完，才实有用，杨廷和因其奏己，乃遂处以充军之罪，实未免有过忍之心。是诚徒树党报怨之私，全无忠君爱国之实者矣。”<sup>⑩</sup>赵俪生先生批评道：“正德、嘉靖朝鼠目寸光的君臣们，痛惜一点绢帛、锦缎、文绮、纱罗、饲养狮子等猛兽所费的羊只、以及来往接待迎送之费，换来的却是西北边境上无休止的纷扰。”<sup>⑪</sup>在清除杨廷和集团的同时，世宗力排众议，在张璁、桂萼等人的支持下，起用被杨廷和集团试图置于死地的王琼，是嘉靖革新的重大举措。而王琼也不负众望，“在河西，反彭泽所行事”<sup>⑫</sup>，在世宗的支持下解决了哈密危机，恢复了明廷与西域的朝贡秩序，则是嘉靖革新的一大成果<sup>⑬</sup>。如果不清除杨廷和集团，就无法解决哈密危机和恢复与西域的朝贡秩序。所以说，清除杨廷和集团符合明朝的最大政治利益。

### 三、张居正无法超越嘉靖革新

世宗即位时，明朝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程。武

宗时期，已经积重难返，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各处灾异频仍，人民困苦，盗贼生发，虏寇猖獗。兵戈相寻未已，仓库所在空虚。而四川等虏腹里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继至。仓庾满目，呻吟满耳，地方之疲敝极矣。”<sup>⑭</sup>武宗“灾难性的16年统治让一切事物都在军国主义、淫乱放荡、贪污腐败的沼泽中腐烂”<sup>⑮</sup>。如不进行自我革新，就难逃覆灭的命运。武宗的暴亡绝嗣在客观上为明朝的自我革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把握这一机遇而进行切实的革新，最大限度地清除历史积弊，是武宗死后最迫切的政治要求。那么，由谁来领导这一革新呢？这是研究该时期革新活动需要理性回答的首要问题。尽管杨廷和在皇位空缺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由此认为革新活动一定要由杨廷和来领导。因为明朝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世宗是权力的核心。正是由于皇位的异常更迭根本不可能使杨廷和获得更大的权力，故必须要遵守政治规矩，而不是借机攫取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站在世宗的角度来要求杨廷和，在这一特殊的敏感时期，他必须要利用有利时机与新帝建立起良好的君臣关系，在世宗的支持下从事革新活动。这是杨廷和唯一的、最佳的路径选择。要在与世宗对抗中强化阁权，那是痴人梦呓。世宗即位伊始由杨廷和所引发的“大礼议”就已经决定了其覆灭的必然命运。

在中国古代，王朝内部较大的人事更迭是激烈而又复杂的政治斗争，搞得不好，将会导致王朝的衰败乃至瓦解。而要实现有序的、成功的人事更迭，则是极为困难的，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明世宗敢于斗争，借助“大礼议”将庞大的杨廷和集团彻底铲除，组建了自己能够控制的新班底，是空前成功的案例。明人郑晓认为：“论大礼入内阁者，席文襄、张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礼书掌詹事府事。若杨文襄再入阁，以称张疏，李文襄以谕德是张说入阁。”<sup>⑯</sup>铲除杨廷和集团和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就是世宗朝政治革新最显著的特点。这是明朝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变革最明显的区别，是世宗在永乐以后对明朝政治所做的最大贡献。

自晚清以来，学界对明朝改革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从最初只讲“张居正改革”，经后来的“隆万大改革”，到当下的“嘉隆万改革”，反映着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化。而这一变化切实反映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认识明朝改革起点的问题。三种不同的认识都指向一种现象，即皇位的更迭。“张居



正改革”以穆宗的去世和神宗的即位为起点，“隆万大改革”以世宗的去世和穆宗的即位为起点，“嘉隆万改革”以武宗的暴亡和世宗的即位为起点。其中前两个起点是正常的父死子继，是一般的皇帝即位模式，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人事更迭，也不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震荡，前朝的政治影响力依旧很大。而后一个起点则完全不同，所引发的人事更迭前所未有，对前朝旧臣的打击和较为彻底的清除前所未有，具备最佳的改革起点，是永乐以来其他时期皇位更迭之际难以比拟的。张璁认为“君臣自古难相遇，宠异如斯报益难”<sup>⑤</sup>“君臣原一体，上下尽通情”<sup>⑥</sup>“君臣共休戚，远近可分忧”<sup>⑦</sup>。利用在“大礼议”中与世宗建立起的新型的可靠的君臣关系，“苞苴不入”的张璁以极大的勇气从事一切可能的变革，表示“孚敬遭逢明主，宠异非常，莫知为报，惟委身忘家，敢以自许”<sup>⑧</sup>。王世贞论道：“公为相，务以明天子尊，信国体，重辅臣体。”<sup>⑨</sup>而这一“眷顾之厚，始终不替”<sup>⑩</sup>的君臣关系是明朝阁臣有效影响政治的首要条件，但阁臣杨廷和无法得到武宗和世宗前后两位皇帝的倚信，后来的张居正尽管是“名副其实的专断独行的摄政者”<sup>⑪</sup>，但也难以获得神宗的真正信任，仅靠太后和太监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嘉靖至万历三朝为世宗、穆宗、神宗祖孙三代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其中世宗具有特殊的地位，决定着隆庆、万历两朝的政治走向，使这两个时期的君臣深受嘉靖政治的巨大影响和明显制约，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作为顾命之臣，张居正主要的责任是培养幼君神宗和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不可能以从事改革为首要任务，也不可能超越嘉靖革新而另起炉灶，而只能是打着效法祖宗之制特别是世宗之制来约束各类政治势力，竭力维持现有的政治秩序<sup>⑫</sup>。这是张居正行政的显著特点，不能刻意回避。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在黄仁宇认识的基础上强调了张居正因循守旧的一面，这是比较理性的。他认为“在天下太平之后，张居正想方设法不要损害和平环境。他处理军事问题的办法多数时候因循守旧”，进而认为张居正“并没有推出什么富有想象力的新政”，其在世时，“他所支持的防御和对外政策得到了继续。但是，这些政策依赖于他的特殊权力的支持：一旦他的支持消失，那些过去的争执又浮上了水面。他没有能够重新改组机构，而只是利用个人权力控制住了他们。”<sup>⑬</sup>

片面地以“改革”为第一视角来凸显万历初政

的特点，既不符合政情，也不符合张居正的身份。换言之，首辅张居正首要的任务是辅佐幼主神宗，以确保皇权的顺利移交，而绝不是以政治改革为第一要务。正是由于皇帝年幼，维持政局的稳定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故张居正只能违规以强化与内廷势力的合作。汪荣祖认为：“万历以冲龄即位，不能亲自执掌皇权，大权实在两位太后，以及太监冯保与大学士张居正之手。太后因皇帝而贵，太監则以得太后之欢心而贵，张大学士因得力于冯保而能排斥高拱而专擅国柄十年……老太監冯保乘权力交替之际，利用太后与内廷的势力，与张居正勾结，不惜伪造遗命，除去共同的政敌大学士高拱，使自己与内阁大臣同受顾命。万历坐上皇帝宝座，冯保站在旁边，久立不下，举朝大骇，展示了他的声势。”<sup>⑭</sup>也正由于此，该时期内廷势力的干政也就不可避免，成为明代中后期内廷干政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一情形与武宗死后杨廷和所面临的情况有点类似。但由于张居正是顾命大臣，在一定程度上拥有顾命权力的合法性，与杨廷和在武宗暴亡后的乱局中被迫而为有所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两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即如何适时而顺利地将皇权移交到新皇帝手中。杨廷和没有处理好这一莫大难题，张居正就能避免重蹈杨廷和的覆辙？从神宗的角度来说，其与世宗一样，在即位之后面临着如何从张居正手中获得本该属于自己“乾纲总揽”的权力。尽管神宗与世宗面临的情况不同，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不同，但获得属于自己全部皇权的追求则是一致的。一些学者一味放大张居正的能耐，把张居正视为当然的执政者，而不愿涉及何时向神宗交权这一核心而又敏感的问题，自然，他们就无法接受张居正被清算的悲惨遭遇。只要认清了杨廷和的必然下场，也就不难理解张居正死后的际遇。明人于慎行就此论道：“万历初年，江陵用事，与冯瑄相倚，共操大权，于君德夹持不为无益，惟凭籍太后携持人主，束缚铃制，不得伸缩，主上圣明，虽在冲龄，心已默忌，故祸机一发，遂不可救。”<sup>⑮</sup>王天有认为：“严嵩、张居正的权力确实超出了议政范围。现在很多人说张居正的考成法有助于改革，但是不要忘了，考成是行政部门的事，不是内阁的事，所以但凡内阁首辅权力超出议政范围的，最后下场凄惨。”<sup>⑯</sup>张居正并没有认真吸取杨廷和的历史教训，故无法走出杨廷和的怪圈。只要理性地看待杨廷和、张璁、张居正对权力的态度，就会明白他们三

人政治命运的不同归宿。

在张居正研究中, 尽管对其在神宗即位后的身份有不同的认识, 有的称其为“政治家”或“著名政治家”, 有的称其为“著名首辅”, 有的称其为“改革家”, 但在叙述其政绩时, 大都不加辨析, 以“改革”“改良”“中兴”等词来表述其行政特点, 皆没有讲清与嘉靖革新的关系, 孤立地就万历初政来谈张居正的事功。如《中國名君名臣政蹟辭典》认为“神宗年幼即位, 委政居正, 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针对嘉靖、隆庆积弊, 锐意改革”<sup>⑥</sup>。《中国通史词典》认为“万历初年, 神宗年幼, 他得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与冯保的支持, 放手改革”<sup>⑦</sup>。《中国人名大词典》认为张居正“在任时厉行革新。推行考成法, 整顿吏治, 清丈田亩, 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改革赋役制度, 把各项税收合而为一。用潘季驯浚治黄、淮。执政十年, 成效显著, 死后即遭弹劾, 后复夺官爵, 籍没家产。天启二年(1622), 追复原官”<sup>⑧</sup>。《二十六史大辞典》认为张居正在驱逐高拱后便为首辅, 以“尊主权为号令进行改革, 清丈土地, 推行一条鞭法, 裁汰冗费, 任用将才防御鞑靼, 用潘季驯主治黄河, 使明中期的政治出现一度的中兴”<sup>⑨</sup>。这些表述基本上反映了首辅张居正所做的主要事项, 人们将其不加辨析而一概视为改革举措, 对张居正反复所讲自己的行政就是“循名责实”或“综核名实”或“凡事务实”的真实含义不予理会, 既对其辅政期间“政尚严”<sup>⑩</sup>不做一理性的探讨, 又对其举措与世宗行政关系不做系统的考察。朱东润认为张居正“平时常说遵循祖宗成宪”, 假如“我们要探求张居正创制行为, 那便只有他底考成法”<sup>⑪</sup>。但对于考成法, 张居正自己明确指出不是创新之制, 而是强调考成法为“祖宗成宪, 第岁久因循, 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 申明旧章”, 以“重诏令”, 并一再重申: “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sup>⑫</sup>。基于此, 张居正才决意尽一切可能向眼前视祖宗法令为无用的行为开刀。这是认识首辅张居正行政的基点。

张居正“生平颇爱权力, 而且定要全部权力。”<sup>⑬</sup>朱东润认为: “独裁, 独裁, 惟有独裁, 才是居正底理想”<sup>⑭</sup>, 他把神宗“当后主看”<sup>⑮</sup>, 并在李太后的影响下, “造成居正和神宗的决斗”<sup>⑯</sup>, 使张居正“实际是从一般的君主政治走向独裁政治”, 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sup>⑰</sup>。尽管张居正与李太后、太监冯保共同挟持皇帝, 对神宗即位后的行政有较

大影响, 但该时期的决策程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所有政令皆以神宗名义下达, 张居正始终都是神宗领导下的阁臣。他的建议只有获得神宗的批准后才能变为行政命令。张居正有时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也是清楚的, 如万历六年(1578)面对俺答汗致书张居正要求朝廷代为建寺供佛等事时, 张居正对甘肃巡抚侯东莱说道: “孤职在密迹, 义不得与外夷相通。”<sup>⑱</sup>如何理性地认识张居正的“独裁”权力与神宗拥有正当权力要求之间的矛盾, 如何理性地认识神宗即位后政局的特殊性与明朝政治运行的一般性关系, 仍然是需要认真解答的一个关键问题。

神宗即位后, 张居正所扮演的顾命角色的确与一般的阁臣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居正的权力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何顾命, 如何辅政, 考验张居正的仍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问题, 即能不能处理好君臣关系的问题。张居正必须明白, 时人对冯保专权的憎恨, 也必然导致对自己的厌恶, 这是其挥之不去的阴影, 以致于“士论洶洶”, 误以为其有“异图”<sup>⑲</sup>。而神宗即位后的新政既有新君登基时依据即位诏书所行“新政”的一般特点, 又有延续嘉靖革新的新特点, 因此, 才使神宗新政与其他时期的“新政”有所不同。将万历初政的平稳发展归功于张居正, 而无视嘉靖、隆庆政治的深刻影响, 显然是偏颇的。

#### 四、结语

从张璁到张居正, 反映着“嘉隆万改革”60年的历程。新选进士张璁能够突破杨廷和集团的禁网, 不畏强权, 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揭开了明朝历史新的一页。从公开上疏反对杨廷和的主张开始, 张璁就是世宗时代新生力量的代表。张璁旗帜鲜明地支持处于困境中的世宗, 成为世宗的“人生导师和心理治疗师”<sup>⑳</sup>, 及时地弥补了杨廷和的不足, 契合新君构建政治新秩序的时代要求。正德、嘉靖之际明朝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实现皇权的顺利过渡, 以确保武宗皇权全部转移到世宗手中。在“大礼议”中, 世宗看清了谁是异己力量, 谁是自己的依靠力量。所以, 张璁的崛起势不可挡, 不论杨廷和及其追随者怎样诋毁张璁, 都不可能阻挠他的强势崛起。

与张璁相比, 首辅张居正并不具有从事革新的政治条件, 而只能是利用顾命身份进一步完善嘉靖革新。所以, 张居正的行政特点是在遵循“祖宗成宪”中的“循名责实”, 而不可能进行超越嘉靖革



新的变革活动。离开了嘉靖革新的参照，就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行政特点<sup>①</sup>。从政治革新的角度来看，张居正兼有张璁的特点，暂时在后宫的支持下进一步延续了嘉靖革新；而从皇权转移的角度来看，张居正又兼有杨廷和的特点，其未能处理好皇权顺利移交问题。两相比较，后者是认识张居正的关键视角。由于张居正未能适时地将穆宗皇权完全转移到神宗手中，一再延长顾命政治，使万历前期积累着难以控制的变异力量，神宗利用张居正的病逝将积压的愤懑发泄出来，对其展开了全面而彻底的清算，“整个万历年间就没有人敢提起张居正”<sup>②</sup>。在清算张居正之后，又没有出现第二个张璁，神宗不再倚信任何朝臣，无法形成新的改革活动，内阁中枢因张居正的顾命而迅速弱化，在张居正和神宗先后防范出现“第二个张居正”的政治禁网中，能臣不再，内阁活力丧失，阁权弱化，明朝因此迷失了方向，衰败不可避免<sup>③</sup>。正如万历末年吏科给事

中梅之焕所言：“天下尽为虚文所束缚。有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则曰苛求。事未就而谤兴，法未伸而怨集。豪杰灰心，庸人养拙，国事将不可为矣。”<sup>④</sup>崇祯帝继位后，也没有出现像张璁一样的可靠之臣，尽管连连更换阁臣，也无可用之重臣。没有了担当之臣，没有了君臣的团结合作，崇祯君臣就不可能带领明朝走出困境。“十六世纪末银本位经济体系的转变，再加上可察觉的政府无能以及长期的民怨，最终导致了十七世纪初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除此之外，包括干旱和饥荒在内的一系列自然灾害也使明朝几近崩溃。”<sup>⑤</sup>其中，“政府无能”是明朝亡国的关键因素，其表现形式就是在张居正之后既无力进行超越嘉靖革新的变革活动，没有出现像张璁一样的改革之臣；又难以切实执行祖宗法度，没有出现“综名实、振纪纲如江陵者”<sup>⑥</sup>的强力执行者。

#### [注 释]

- ① 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纲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页。
- ② [日] 宫崎市定著，焦堃、瞿柘如译：《宫崎市定中国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402页。
- ③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823页。
- ④ [明] 费宏：《两宫尊号礼成群臣贺表》，[明] 费宏撰，吴长庚、费正忠校点：《费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0—161页。
- ⑤ [加] 卜正民著，潘玮琳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97—98页。
- ⑥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第820—821页。
- ⑦ [美] 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 ⑧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第396—397页。
- ⑨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第787页。
- ⑩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7《阁部离合》，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 ⑪ 何孝荣：《论姚广孝与“新明朝”的建立》，《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
- ⑫ [美] 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第156页。
- ⑬ [美] 牟复礼、[英] 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5页。
- ⑭ [明] 郑晓：《今言》卷3，第一百九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110页。
- ⑮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第1000页。
- ⑯ 《明史》卷198《王琼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234页。
- ⑰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第998页。
- ⑱ [美] 牟复礼、[英] 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485页。
- ⑲ [明] 明世宗：《敬一箴及注程子四箴》，蔡副全：《陇南金石题壁萃编》，中华书局，2021年，第453页。
- ⑳ [明] 张璁撰，张宪文校注：《张璁集》文稿卷4《谢赐〈五经〉〈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24页。
- ㉑ 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五年八月十九日甲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 ㉒ 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 ㉓ 蓝法典：《论阳明心学语境下的“外王”之道》，《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4期。
- ㉔ [美] 牟复礼、[英] 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489页。
- ㉕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 ②6 [美] 牟复礼、[英] 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 487 页。
- ②7 参见田澍：《张璠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璠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
- ②8 参见田澍：《张璠与大礼议——大礼议新解》，《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9 期。
- ②9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第 697 页。
- ③0 [明] 谈迁：《国榷》卷 53，嘉靖六年十月乙巳，中华书局，1958 年，第 3364 页。
- ③1 [美] 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导言，九州出版社，2021 年，第 4 页。
- ③2 王智勇、秦际明主编：《杨慎研究文选》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 页。
- ③3 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66 页。
- ③4 刘益国：《论杨升庵的散曲》，王智勇、秦际明主编：《杨慎研究文选》，第 289 页。
- ③5 曾绍皇：《论杨慎俗文学创作的典范意识》，王智勇、秦际明主编：《杨慎研究文选》，第 350 页。
- ③6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诗稿卷 3《赴南都留别诸友》，第 316 页。
- ③7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诗稿卷 3《呈胡中丞》，第 322 页。
- ③8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文稿卷 5《诰封一品夫人蔡氏墓志》，第 448 页。
- ③9 [美] 牟复礼、[英] 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第 494—495 页。
- ④0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校注：《杨一清集》，第 699 页。
- ④1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附录，第 496 页。
- ④2 [明] 郑晓撰：《吾学编·皇明名臣记》卷 30《太师张文忠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2《史部·杂史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96 页。
- ④3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诗稿卷 3《送李尚书》，第 336 页。
- ④4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诗稿卷续《病中偶成》，第 363 页。
- ④5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文稿卷 5《堂兄筠轩先生传》，第 465 页。
- ④6 [清]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 31《大礼之议》，中华书局，1987 年，第 766 页。
- ④7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文稿卷 5《奉敕撰岳怀王墓志》，第 443 页。
- ④8 [明] 杨一清著，唐景绅、谢玉杰点校：《杨一清集》，第 657 页。
- ④9 [明] 王世贞：《哈密志》，[明]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 332，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551 页。
- ⑤0 [明]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奏疏卷 3《论边务》，第 70 页。
- ⑤1 赵倬生：《明朝和西域的关系》，《东岳论丛》1980 年第 1 期。
- ⑤2 [明]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 13《土鲁番》，中华书局，1993 年，第 462 页。
- ⑤3 参见田澍：《明代哈密危机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 年第 1 期；田澍：《彭泽与甘肃之变》，《西域研究》2004 年第 1 期。
- ⑤4 [明] 毛纪：《乞停遣使西域疏》，[明]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 129，第 1238 页。
- ⑤5 [美] 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第 34 页。
- ⑤6 [明] 郑晓：《今言》卷 4，第三百七，第 174 页。
- ⑤7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诗稿卷 4《斋宫谢恩二首》，第 341 页。
- ⑤8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诗稿卷 4《庆成赐宴二十韵》，第 343 页。
- ⑤9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诗稿卷 4《括苍舟中留别竹居兄四首》，第 354 页。
- ⑥0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文稿卷 6《堂成告后土文》，第 470 页。
- ⑥1 张璠撰，张宪文校注：《张璠集》附录，第 495 页。
- ⑥2 《世宗实录》，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明] 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国朝典故》卷 3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09 页。
- ⑥3 樊树志：《明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21 年，第 218 页。
- ⑥4 参见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42—251 页。
- ⑥5 [美] 阿瑟·沃尔德隆著，石云龙、金鑫荣译：《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第 240—242 页。
- ⑥6 汪荣祖：《明清史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51 页。
- ⑥7 [明]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 4《相鉴》，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2 页。
- ⑥8 王天有：《王天有史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336 页。
- ⑥9 罗耀九主编：《中国名君名臣政蹟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719 页。
- ⑦0 杨宽、方诗铭、程应镠、陈旭麓、沈起炜主编：《中国通史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10 页。
- ⑦1 廖盖隆、罗竹风、范源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年，第 355 页。
- ⑦2 冯涛、宋振豪、周少川、高寿仙、贺和风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九州图书出版社，1999 年，第 1321 页。
- ⑦3 《明史》卷 220《赵世卿传》，第 5803 页。

- ⑦④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 168 页。
- ⑦⑤ [明]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 38《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482—483 页。
- ⑦⑥ 黎东方：《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282 页。
- ⑦⑦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 81 页。
- ⑦⑧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 355 页。
- ⑦⑨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 346 页。
- ⑧⑩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 305 页。
- ⑧⑪ [明]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 30《答甘肃巡抚侯掖川》，第 373 页。
- ⑧⑫ [明]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 4《相鉴》，第 45 页。
- ⑧⑬ [美] 窦德士著，谢翼译：《嘉靖帝的四季》，第 77 页。
- ⑧⑭ 参见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8—270 页。
- ⑧⑮ 汤纲、朱元寅：《明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 年，第 207 页。
- ⑧⑯ 参见田澍：《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史学集刊》2020 年第 4 期。
- ⑧⑰ 《明史》卷 248《梅之焕传》，第 6417—6418 页。
- ⑧⑱ [美] 柏里安著，陈玉芳译：《东游记：耶稣会在华传教史》，澳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8 页。
- ⑧⑲ 《明史》卷 248《梅之焕传》，第 6418 页。

## The Political Upheaval Between Zhengde and Jiajing Reign and the Trajectory of Reform in the Ming Dynasty

TIAN Shu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Since Yongle (永乐) reign, the most significant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the political upheaval between Zhengde (正德) reign and Jiajing (嘉靖) reign. The political change caused by this upheaval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theme is to remove Yang Tinghe group (杨廷和集团) who forced Emperor Shizong to change his parents. The highlight is the rise of Zhang Cong and his school, who advocated law and moral consideration to interpret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full transfer of Emperor Wuzong's imperial power to Emperor Shizong, the old forces were eliminated, politics invigorated, and its influence continued to the early Wanli (万历) period. In fact, the “Zhang Juzheng reform” is Zhang Juzheng's political practice of following the Jiajing Political Innovation (嘉靖革新), or the ripple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 Like Yang Tinghe, Zhang Juzheng did not succeed in transferring all of the imperial power from Emperor Muzong to Emperor Shenzong, rather, the Jiajing Political Innovation was submerged in the tide of comprehensive reckoning of Zhang Juzheng,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a new reform, subsequently the Ming Dynasty went into decline and fell out of control.

[Key words] Emperor Shizong of the Ming Dynasty; great rites controversy; Yang Tinghe; Zhang Cong; Zhang Juzheng; political upheaval; trajectory of the reform

(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